

评现代西方史学主体认识论

林 璧 属

现代西方历史哲学中,一种强调史家主体意识、强调主体认知方法、集中论述史学主体对研究客体的认识方式以及对主体自身能力省察的历史认识论风靡西方,我们权且将此类历史认识论称为史学主体认识论。它以史学认识主体为契机,着重史学性质、认知能力的分析,不仅带动了西方史学的发展,得到了西方世界的普遍首肯,也引发了国内学术界的主体热。于是,如何正确看待史学主体认识便成为史学理论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拟对现代西方史学主体认识论做一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现代西方史学主体认识论的发展,集中体现于 19 世纪末以来的各种强调史家主体认识的历史哲学中,按其流派所属和理论模式的相似性,大体可归纳为如下四种类型。

第一,强调主体在历史认识中通过价值和文化意义等方法论手段而起作用的新康德主义者是第一种理论模式,以狄尔泰、李凯尔特和马克斯·韦伯为代表。

狄尔泰认为,研究人和人的历史,首先是主体的渗入,“历史世界的第一性的要素就是体验,而主体在体验中,同自己的环境处于积极的、生动的相互作用之中。这种环境作用于主体,同时也受到主体的作用。”^①狄尔泰要求历史学家生活在自己的客体里,从内心去体验客体。李凯尔特认为区别自然科学和文化现象的标准是价值,价值也是历史学家选择史料的一个标准,“没有价值,也就没有

任何历史科学。”^②马克斯·韦伯一方面修正、补充和发展了前者的历史认识论,另一方面,又把这种认识方法与实证主义史学方法相结合,从而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韦伯将价值作为历史认识的核心来看待,继承了李凯尔特将价值作为选择史料的标准,反对狄尔泰仅和直觉、移情有关的个人内心体验的理解方法,主张在意义解释的基础上加以理解,反对直觉和内心体验,因为“没有必要为了理解恺撒而去充当恺撒”^③,试图将实证主义传统引入历史认识论,表现在历史认识方法论上,提出“价值无涉”原则和理想类型方法。价值无涉是对研究者的人格要求,防止研究者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到研究方式和对经验材料的解释中去,类似于实证主义史学的“消灭自我”。韦伯的理想类型方法是最重要的一种主体认识方式,在西方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其所谓理想类型,是一种主体根据某些历史现象而加以理想化的逻辑构造,其职能就是使概念化的逻辑构造与其历史的经验实际进行比较,以“帮助历史学家突破特殊性的限制”^④,从而得出接近历史真实的认识。

① 康恩:《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中译本,三联书店 1961 年版,第 108 页。

② 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第 76 页。

③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78 年英文版,第 5 页。

④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93 页。

第二,强调史学认识主体对认识客体的决定性作用的新黑格尔主义,这是最强调史学认识主体作用的一个现代西方最具影响力的分析历史哲学流派,其代表是克罗齐和柯林武德。

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其中之一涵义是指历史是现时现刻活动在历史学家头脑中的思想,是史学家思维的结果,是注入史家主体意识的当代史学著作,而非凭据史料汇编而成的编年史。柯林武德提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作为史学认识主体的历史学家要研究这历史,“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做到,那就是在他自己的心灵中重行思想它们”,“一切历史,都是在历史学家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①重演过去的思想是由于现实的情境涌现出问题,它要求历史来作答,于是历史学家通过把过去的思想纳入今天的情境中并运用自己的全部学识和智慧来批判过去的思想以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

第三,可以归纳为第三种主体认识理论模式的是片面强调史学认识主体作用的以相对主义史学为典型的历史认识论,这是现代西方史学中的一大显学。

相对主义者对历史科学采取一种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并把历史说成是一种可以随主观喜好而任意加以伸张的东西。美国史学家贝克尔最具典型性。他认为,客观的历史过程是无法把握的,对历史的探讨始于历史事实,而历史事实在任何历史学家创造它以前是不存在的,“客观的过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历史领域是一个捉摸不定的领域,它只是形象地被再创造,再现于我们的头脑中。”^②每一个创造出来的历史事实必然加进了个人的某些经验和偏见,而历史知识又随时代变化而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所以,历史变成“只是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历史的定义可以简化为“是说过和做过事情的记忆”^③,史家只能从其时代出发去重构过去并代代重写历史,最终成为“人人都是自己的历

史学家”的绝对相对主义史学模式。

法国的历史批判哲学是续新康德主义历史观的历史哲学,但在具体的史学认识主体中,又是持相对主义的认识模式,其代表是雷蒙·阿隆。他认为,历史认识是由于人们发现了探索过去的现实利益而产生出来的,“人既是历史知识的主体,又是历史知识的客体。”^④历史认识不可能是曾经存在过的东西的完全再现,而是“一种相对性的解释”,“每一个社会有它的历史,历史的记叙随着社会本身的变化而变化,这个过去只有当它不再有未来的时候才能最终地固定下来。”^⑤

波普尔以其科学哲学著称,但其关于历史认识的论述也是十足的相对主义。他认为,历史知识是建筑在无法直接检验的间接经验之上,而且“所有知识都是抽象的,我们无法把握‘社会事实本身的具体结构’”^⑥,所以,在历史认识中,“不可能有一部‘真正如实表现过去’的历史,只能有各种历史的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后的解释;因此每一代人有权去作出自己的解释。”^⑦每一代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观察历史和重新解释历史。”^⑧

第四,强调历史认识是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间双向建构的现代西方历史认识论,是目前所见最具说服力的一种史学主体认识论,代表人物包括爱德华·卡尔、马鲁和伽达默尔。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提出:“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

①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44页。

② 张文杰:《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31、233页。

③ 田汝康、金重远:《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1页。

④⑤⑥⑦⑧ 《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第95、99、155、154页。

⑨ 卡尔·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路特里奇基根保罗1957年英文版,第78页。

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流。”^①一方面卡尔强调历史事实离不开历史学家的解释,历史事实不可能完全是客观的,另一方面他又反对在否定“崇拜事实”时,否定历史所固有的客观性。在客观存在的千真万确的事实和历史学家对这些事实的解释之间,卡尔认为既不能偏重前者,亦不能偏重后者。

法国历史批判哲学家马鲁称历史“是经由历史学家的努力,在思想中取得的对于人类过去的认识”。这种认识“是处于在现在与过去之间由认识主体的积极、主动的介入而建立起来的”。^②

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把历史科学研究中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置于相互开放的关系模式之中,将历史的认识过程视为认识者和认识对象的对话过程,在对话中,双方同属对话的整体过程。伽达默尔的对话过程不同于爱德华·卡尔的“问答交流”,他不仅指出了历史认识过程的特征,而且发展了认识过程学说,将历史认识过程界定为历史意域和现时意域的“融合”。意域(Horizon)是伽达默尔历史效应原则的一个基本概念,用来表达事物(意义)存在的广泛条件和基础。伽达默尔认为,一个字或一句话只有在上下文中才有其确定的意义,一件东西(或如一零部件)只有在与其他东西的关系中才有意义,上下文或上下左右的关系就是事物(事件或文字)存在的意域。意域也是历史事件存在的条件,为了理解历史事件,认识主体必须把自己置身于历史事件发生和产生效应的意域中去,认识主体自身所处的现时意域决定其置身历史意域的能力和趋势,现时意域是在历史的基础上产生的,历史意域则由于历史效应而不断变化,于是,只有在历史意域和现时意域的融合之中,历史事件的意义才能被理解。伽达默尔反对历史相对主义把历史研究当作历史认识过程之外的主观活动,他认为,历史认识主体不是直接制造意义的东西,认识主体一方

面是意域中能动的部分,另一方面它自身又受制于意域。历史事件的理解和解释是历史意域和现时意域的融合,历史认识主体在研究之前的准备不应该清除一切主观因素,而是要更好地装备自己,研究者必须在意识到历史事件的非主观性的同时意识到自身的参与性,研究历史不是“隔岸观火”,而是在历史中研究历史。

二

我们看待现代西方史学主体认识,犹如看待西方文化的任何部分一样,应力求避免简单化和片面性,因为它是一个进步与谬误并存、精华与糟粕杂糅的整体,似不可笼统地加以肯定或否定,应作具体分析。总的说来,现代西方史学主体认识论,在对传统实证主义史学的挑战与批判中,取得了一些成就,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任何一位现代西方史学主体认识论者都鲜明地突出了历史认识的主体性。他们认为,任何历史认识都离不开认识主体的思想,过去的历史或思想只有纳入现在的思想之中并做出评价和判断,才能成为活着或有意义的东西,历史资料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只有史学家的思想、价值判断才赋予其说明历史的价值。实证主义企图让事实本身来说话是一种妄想,真实的情况决不是历史通过我们来说话,而永远是我们通过历史来说话。在这方面狄尔泰强调认识过程中的主体渗入,李凯尔特、韦伯以主体价值观为中心,克罗齐、柯林武德直接强调历史认识主体的思想对历史客体的直接影响,相对主义史学家更直接指出史家在选择主题和搜集历史事实上的决定性作用,突出了主观经验是作为获得历史认识的特殊手段等主体性原则,卡

^① 爱德华·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8页。

^② 《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第78页。

尔、马鲁、伽达默尔则正确地看到了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间不可或缺的认识主体作用。

第二,现代西方史学主体认识论,突出强调了历史与现实的紧密联系,指出了历史认识的目的在于为现实生活服务,这当是正确的历史思维倾向。现代西方史学主体认识论,在猛烈批判兰克史学为过去而研究过去的史学任务的基础上,看到了现实是由历史构成的,从而主张从现实的需要和兴趣出发去研究历史。狄尔泰称“人是什么,只有他的历史才会讲清楚”。“我们生活的音调是取决于伴随着过去的声音的”。^① 克罗齐说:“过去不异于在现在而活着,它作为现在的力量而活着,它融化和转化于现在中”。^② 因为现在生活的兴趣和需要唤醒并复活了过去的历史,所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柯林武德认为,“从一种思想方式到另一种的历史变化并不是前一种的死亡,而是它的存活被结合到一种新的,包括它自己的观念的发展和批评在内的脉络之中。”^③ 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历史理解它,我们就把它合并到我们现在的思想里来,且使我们自己能够通过发展它和批判它而用这种遗产来促进我们自己的进步。”^④ 伽达默尔更直接强调历史意域与现时意域的融合,重建历史与现实的统一。要理解现实就必须理解历史,要理解历史又必须理解现实。伽达默尔的理论见解达到了相当高的认识水平。

第三,现代西方史学主体认识论,从主体性原则出发,否定了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认识主体对历史认识具有绝对性或终极意义,正确地看到了历史认识的相对性。李凯尔特和马克斯·韦伯都一再强调,社会历史科学不可能完全再现全部的事实,史学家更不可能展现某个事件的全过程,即使最简单的事件也不可能。相对主义史学则直接表述了历史认识所不可避免的相对性,如美国另一位相对主义史学家比尔德说,历史学家是时间、空间、环境、利益、偏爱和文化的创造物。如此

历史认识主体的立场、理论和主观选择决定着观察历史的角度和内容,也规定着历史事实的意义,那么,任何历史认识都是认识主体的自我认识,认识主体无论如何都难以“超越时代”、“超越自我”和“消灭自我”,都不具有绝对的意义。

现代西方史学主体认识论在取得了某些成绩的同时,其认识论中也存在着理论谬误,当加以深刻的分析批判。

首先,在历史本体论上,现代西方史学主体认识论把历史发展归结为人的精神、思想的发展,否认了历史本体的存在。狄尔泰继承了黑格尔的自然与人类精神分类法,将整个人类历史视为一部精神史,将人类所创造的业绩视为精神的客观化,认为历史研究只有通过它们,人类的精神才能客观地得到认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揭示位于其中的人类精神的内在积极性。从克罗齐的“精神即历史”到柯林武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新黑格尔主义历史哲学家将人的本质、人类社会的本质乃至人类历史的发展都归结为精神和思想的发展,这种只看到人类所具有的精神属性,无视人类其他本质属性的存在,尤其是看不到人类所具有的实践性,必然无力说明人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更无力将历史研究对象从“抽象的人”具体到活生生的、从事物质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始终停留于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者的认识水平,将人类历史看成抽象的人的精神的历史发展,也就无法从根本上说明人类历史的发展。

其次,现代西方史学主体认识论大多否认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存在。狄尔泰认为任何历史整体都只有个性,都是不重复的,因而也没有什么历史规律可言;李凯尔特认为,社

① 《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第9页。

②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8页。

③④ 《历史的观念》,第256、261页。

会历史领域,一切都是个别的、不重复的,如果用一般规律去硬套,妄图确定某些一般原则,那真是莫大的荒唐。“历史概念,亦即就其特殊性和个别性而言的一次发生事件这个概念……和普遍规律概念处于形式的对立之中。”^①新黑格尔主义将精神、思想视为历史发展的唯一载体,由于人的精神互不相同、各有特色,而且变化莫测,不受规律支配,自然也就无所谓规律。如克罗齐说:“历史和诗歌、道德意识、思想一样,没有管理它的规律,人类在实证和自然科学中所形成的那些规律在这里是没有的。”^②波普尔坚决否认历史规律的存在,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解释,也反对一切“历史主义”的(包括唯心主义的)规律解释,将规律解释指斥为历史决定论,认为历史只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最多只能根据普遍的自然规律去说明事物的因果关系,历史永远也不可能上升到普遍的理论,永远也不可能进行普遍的概括,这是非常错误的。

第三,现代西方史学主体认识论,不合理地缩小了历史认识范围。新康德主义者将社会历史科学视为事件科学,只研究文化科学中的特殊性与个别性,只研究人类文化中那些有文化意义和价值的历史事件;新黑格尔主义者将历史科学视为只研究人类精神、思想的发展,人类历史发展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事件、社会发展中非精神因素的物质力量等都被他们关在了历史研究大门之外,人类非理性因素(包括情感、人类本性和潜意识等)在柯林武德那里也被排除在历史学之外。如此历史认识,根本无力说明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

三

现代西方史学主体认识论,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强调认识主体的作用,认识主体又必然受其时代的限制、受其个人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影响,那么,强调认识主体的作用是否会在方法论上滑入主观主义或唯心主义?我们肯定认识主体的作用是否会成为错误的

评判?对此,我们还需对不同的史学主体认识论进行具体的分析评判。

从强调认识主体的作用这一历史认识论出发,可以产生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认为既然主体认识要受其时代和个人的限制,其认识结果无论如何都是相对的、有限的,那么,认识历史归根到底是毫无意义的,历史是不可知的,对历史的研究可以根据主观偏好加以伸张、取舍,这种倾向是错误的,应加以坚决的批判。如美国相对主义史学家贝克尔等人,片面强调主体性,把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局限性当作历史本身来看待,并把它作为客观存在的历史的相对性乃至虚幻性,使其关于“历史事实”的形成或描述完全成为依赖思维主体而存在的精神范畴。将“历史事实”的形成完全视为主观杜撰的东西,无视客观历史过程的存在,否认历史材料的真实性,甚至将客观历史进程与对历史的认识混为一谈,从而陷入绝对相对主义和神秘主义的不可论之中。

另一种倾向则恰好相反,它自觉地意识到主体认识能力上的局限,并在这种自我批判的基础上更审慎更清醒地去努力认识历史,在实践中努力去扩展和深化对历史的认识,深信这种努力的价值和意义,这是正确的、积极的主体认识论,在现代西方史学主体认识论中,波普尔是这一种倾向的典型。

关于历史认识,波普尔以境况分析法介入。“历史学家对境况的分析是他的历史猜测”,“是整理客观论据来证明或者反驳自己推测性的境况分析。”境况分析就是“去重建行为者所遇到过的问题境况,使行为者的行为变得适合于问题境况。”“我们对境况的猜测性重建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发现。”^③

① 《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第17页。

② 《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第332页。

③ 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98—199页。

历史境况分析是波普尔涉入历史学的一个理论支点,这一境况分析与其猜想与反驳的理论相结合,力图在理解的过程中实现理解的客观性从而达到认识的真实性。

理解是个人的、主观的、心理的活动,如何消除理解—认识过程中的主观性呢?波普尔将理解同猜测与反驳的解题方法联系起来,用解题来消弥认识过程中的主观性。理解即解题,波普尔用 $P_1 \rightarrow TT \rightarrow EE \rightarrow P_2$ 公式来表示理解过程。式中, P_1 是起始问题, TT 是试探性解释, EE 是对 TT 的批判性说明, P_2 是产生的新问题境况,它来自 P_1 并将导致 $P_3, P_4 \dots$ 以至 P_m, P_n 。依此,“满意的理解”就是 TT 被证明能够“阐明新问题即我们意料以外的问题”,或能够解释许多起初未曾看出的附加问题,进而,理解的进展就能够通过比较 P_1 与我们后来的新问题以至 P_n 来比较、衡量,从而达到认识的真实性。解题公式即理解公式,将解题公式用于理解,即使第一步达不到解答题目的,就会提出一个替代性问题,或穷追解题的终极意义,如此,谁能说解题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于是,主观理解活动在波普尔猜测与反驳的过程中变成了客观知识的增长。当然,波普尔的理解理论在历史认识中是否具有普遍性或可操作性,尚缺经验研究的支持。

四

综观现代西方史学主体认识论的发展,核心是主体认识的方法论问题。从狄尔泰开始逐步张扬主体的作用到贝克尔等人片面夸大主体的作用——将主体认识的历史等同于客观历史的主观唯心主义——再到伽达默尔强调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间双向建构的历史认识的理论构架,经历了一个从量变走向极端再到质变的过程,亦使主体认识理论日渐成熟。在评判现代西方史学主体认识论时,我们应当肯定那些曾为深化历史认识而做过不懈努力的人们,同时以主客体矛盾中

的客观性为衡量标准——因为在历史认识过程中如何达到认识的客观性迟至今日仍未见有哪一种理论彻底地解决过,它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这是现代西方史学主体认识论的不足。

总而言之,狄尔泰的移情理解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深化对历史的认识,但他本身始终无法克服由于使用这一方法而产生的主观随意性,最终不可避免主观主义。而李凯尔特价值方法,按其原话说来,“关于价值,我们不能说它们实际上存在着或不存在,而只能说它们是有意义的,还是无意义的。”^①“价值决不是现实”^②,是超验的,是经验的认识所达不到的,这种价值,是一种先验的存在,是一种实际上并不存在、神秘离奇的东西,是一种虚构。在史料选择上运用价值方法,问题在于先验的价值作为选择标准,又怎么能够达到选择史料的准确性,又怎么能够尊重历史事实,从而达到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韦伯试图克服狄尔泰的主观移情理解方法,采用意义解释上的理解和因果说明相结合,并运用理想类型方法对经验事实进行分析,这是他的成功。问题出在韦伯既以价值作为选择史料的标准,又要求研究者在认识过程中要消灭自我地运用“价值无涉”的客观态度,这真是一种矛盾的又无法达到的主体认识方法,使其理论难于自圆其说。

在新黑格尔主义的史学主体认识论中,将历史视为历史学家的思想与古人的思想相互交流的产物,这在方法论上大大前进了一步,但他们的理论是否能达到客观性呢?克罗齐的理论观点能否克服主观主义便被归结到其历史认识途径的“思想”、“思想活动”的性质上。他说:“思想即判断”,^③即思想活动采取的是判断形式,运用个别与一般的形式判断。诸如将“拿破仑”(主词,代表个别现

^{①②} 《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第21,78页。

^③ 《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第91页。

象)判断为“欧洲的征服者”(宾词,代表普遍意义的概念)、或判断为“欧洲的解放者”、“欧洲的专制暴君”等,以此去认识历史。按其论证,史实并非先已独立存在,而是经过史家的思考才显示出意义,史实及意义是在思想或精神活动中同时产生的,史实与意义的结合才构成一个历史判断。问题是,如此思想活动的历史判断如何达到认识的客观性或真理性呢?克罗齐显然没有解决。柯林武德的主体认识论,除了其历史认识的思想与克罗齐的精神、思想具有同样的本质缺陷外,还在于史家主体认识方法的“重演”上。按其原意,重演不是简单的临摹,更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但在具体历史条件变化的情况下,过去的思想与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已经脱离,要求当代史家重演古人的思想行动又如何可能?实际上,历史认识本身也不需要移情认识的重演。他又主张重演是在纳入今人的情景、思想中进行,如此一来,岂不有多少个史学家便有多少种不同的历史,岂不使历史永远陷于绝对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之中?可见,其重演的史学主体认识方法绝不可能是一种正确的认识方法。

贝克尔为代表的美国相对主义史学主体认识论是一种十分明显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无需重墨评判,而雷蒙·阿隆、马鲁、爱德华·卡尔的理论,虽然正确地看到了历史是现在与过去双向建构的产物,但他们始终没有给定一个达到客观性认识的方法。

在现代西方史学主体认识论中,只有伽达默尔的效应历史原则在其自身理论解释中达到了较高的理论水平,也使其理论能自圆其说。

伽达默尔的效应历史原则强调历史认识是历史意域与现时意域的融合,那么,怎么摆脱主观主义呢?怎样才能达到历史认识的客观真理性呢?伽达默尔分三个层次回答了这一问题:

第一,现时意域并不等于主观随意性。

这是因为,历史认识过程表现为有条件的能动性,历史学家的活动本身是有效应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我们之所以作为认识主体是由我们所处的历史传统决定的,不可能超然于历史进程。即使是游戏,离开了游戏者游戏就不存在,游戏者又不能完全地随心所欲;因为游戏之为游戏,总是贯彻着一套相对稳定的规则,有如体育竞赛,不能没有运动员参加,运动员又不能脱离竞赛规则一样。

第二,历史研究正如理解一件作品一样,总期望对它有一个圆满或完整的意思,这种寻求圆满和谐性限制了主观随意性。这是因为,在确定某一历史事件的意义时,历史学家总是期望对历史事件有一个圆满的意义,在历史意域和现时意域的融合中寻求圆满意义,必然要求在确定意义时消除逻辑矛盾,力求事件在意域的融合中处于和谐的关系之中,任何主观随意性都不可避免地破坏历史意域和现时意域的一脉相承性与和谐性,从而破坏历史事件的圆满意义。因此,寻求圆满与和谐可以限制主观随意性。

第三,历史学家在理解历史也就是要达到历史意域与现时意域的融合中寻求圆满与一致时,受到了两方面的约束,一方面,他受意域的约束,他必须使自己的见解能与历史和现时双重意域和谐一致;另一方面,他要面对整个社会群体,他必须要求自己和其他研究者在一些基本原则方面和谐一致。这方面要求迫使研究者的主观随意性失去了存在根据。

伽达默尔的效应历史原则目前是一种新颖而又较全面的理论阐释,但绝不是最终的解释。

我们评判现代西方史学主体认识论,其意义不在于给定一个具体的答案,而在于强调主体认识的重要性和对主体认识的不懈探索。

(作者:林壁属,厦门大学历史系讲师;

责任编辑:明言)